

政治學報 第四十七期 2009年6月 頁59-103

1978年以後中共財經高官的政治流動 ——特徵與趨勢

寇健文*、陳方隅**

摘 要

本文認為中共目前具有「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和「後極權主義」兩種特性，這兩種特性共同影響政治菁英的甄補。本文以1978~2008年之間，被中共拔擢擔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副部級以上職務的258人為對象，探討中共政權二元特性對財經高官甄補的影響。受到「發展型國家」特性的影響，財經高官的市場經濟專業性日益提升，反映在研究生以上學歷者已成主體，具有經貿管理專業的比例愈來愈高，前往歐美國家留學的比例也逐漸提升，並以攻讀學位為主體。財經高官的工作經歷多半以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為主，出現「系統內流動」的趨勢，惟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與專業經濟部門、國有企業之間的相互流動仍占一定比例。在「後極權主義」特性的影響下，政治憑證對於財經高官的仕途發展也很重要，表現在財經高官的黨員比例極高，同時隨著職務級別提升，具有專任黨職經歷的比例明顯提高。不過，入黨年齡已經不再是重要的政治憑證。

關鍵詞：中共、後極權主義、財經高官、發展型國家、菁英甄補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四年級學生

投稿日期：2009年1月11日；通過日期：2009年4月13日。

The Political Mobility of Chinese Economic Technocrats since 1978: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Chien-Wen Kou* · Fang-Yu Chen**

Abstract

Political recruitment, a crucial function of a political system, is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nature of the system. Analyzing 258 ranking officials who have ever occupied a post at the full or vice-minister levels in the ministries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his paper demonstrated the impact of the duality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regime - both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totalitarianism - on the recruitment of economic technocrats. The attribute of developmentalism leads to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Most economic technocrats completed graduate studies and were trained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bout a quarter of these technocrats had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s and usually obtained a degree from overseas universities. Moreover, these officials' career pattern revealed that they were usually promoted from ministries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nd usually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ost in these ministries. In the meanwhile, political credentials remained important for the mobility of economic technocrat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economic technocrats were CCP members and the experience of Party posts became important in the upward-mobility of these officials.

Keywords: China, developmental state, economic technocrats, elite recruitment, post-totalitarian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Student,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壹、前言

菁英甄補是政治體系存續的一個重要關鍵。一方面政治甄補的模式與篩選標準受到政權型態的影響，另一方面政治菁英被甄補到政權內部之後，其思想行為又會影響政權的存續。因此，菁英甄補提供外界評估政治體系穩定性與變遷方向的重要指標。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發表不少研究中共政治菁英的成果，有的偏重討論菁英政治制度化的現象，有的則關注特定菁英群體的仕途發展。在2002年11月十六大之前，已有學者探討中共菁英政治朝制度化發展的現象（寇健文，2001：1-17，2002：53-72；Bachman, 2001: 95-100; Dittmer, 2001: 53-67; Shambaugh, 2001: 101-111; Shirk, 2001: 139-142; Teiwes, 1995: 55-94）。在十六大結束之後，學者普遍認為正式關係的重要性已顯著提升，展現在領導人更替的正式規則、非正式慣例或實例逐漸形成，以及集體決策模式逐漸明朗（寇健文，2005，2006：39-75；Bo, 2005: 162-189; Dittmer, 2004: 10-32; Huang, 2008: 80-97; Miller, 2008: 61-79; Nathan, 2003: 6-17; Zang, 2005: 204-217; Zheng, 2003: 63-66; Zheng & Lye, 2003: 65-86）。

另外，學者也研究特定菁英群體的仕途發展，如技術官僚、省級菁英、團系幹部、海歸派。李成(Cheng Li)與White認為技術官僚已是中共政治菁英的主要來源，形成技術官僚政治(technocracy)(Li, 2001: 25-50, Li & White, 1988: 371-399, 1998: 231-264)。臧小偉(Xiaowei Zang)則提出菁英甄補二元論(elite dualism)的觀點，認為中共政治菁英是由技術官僚與黨務行政官僚共同組成，各有甄補管道，無法相互取代，形成政治——技術官僚政治(political-technocracy)。技術官僚集中在政府專業部門，黨務菁英仍以組織、統戰、宣傳、紀檢等系統出身的人為主，形成「功能性分化」(Zang, 1991a: 123, 1991b: 523, 1993: 801-802, 2004: 165-170)。

此外，部分學者關注省級黨政領導幹部。薄智躍(Zhiyue Bo)指出，地方各省逐漸成為領導人的訓練場所，優秀的省級領導人可能成為中央領導人，而原本在黨中央和國務院職能部門任職的幹部則被派往地方歷練(Bo, 2003: 66-117)。除了分析學經歷等背景外，學者也討論省級菁英推動地方經濟的

影響（徐現祥、王賢彬、舒元，2007：18-31；Bo, 2002）。這些分析省級幹部的文獻雖然並未處理權力繼承的問題，卻凸顯省級領導職務的重要性。

寇健文(2007a：49-95)則研究團系幹部與海歸派高官，他認為團系崛起是受到派系考量與共青團組織任務的共同影響。共青團具有輸送優秀幹部到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任務，還吸納不同背景的一年輕幹部進入共青團任職。這種以全國為範圍的幹部輸送與吸納功能，都是傳統派系沒有的優勢。不過，團系幹部的經歷多半以黨務行政部門為主，經貿管理科技部門較少，無法成為政壇的唯一支配力量。

他同時指出，中共甄補歐美海歸派的模式可稱為「既重用又防範」（寇健文，2007b：1-28；Kou, 2008）。中共一方面進行經濟建設，不吝於重用留學歐美的專才；另一方面提防傾心西方民主政治的人士進入體制任職。因此，中共在經貿科技部門重用海歸派，但很少在組織、宣傳等要害部門晉用海歸派。同時，中共偏好滯留國外時間短、公派出國的海歸派，長期滯留國外、自費出國的海歸派就較難受到青睞。他們通常透過高校研究單位、人大政協、政府科教文衛等專業部門晉升，以黨務部門為晉升管道的情形則不多見；此外，相當比例的海歸派並非中共黨員。

儘管現有文獻的成果相當豐富，但學界十分缺乏對中共財經高官的分析。中共改革開放是以經濟改革為核心，負責宏觀經濟調控的官員自然扮演重要的角色，攸關市場轉型與經濟發展的成敗。對於財經官僚研究的不足實為現有文獻的一個缺憾，唯一的例外是Naughton(2008)的政策分析。不過，他只針對特定經濟政策決策者(economic policy makers)的決策偏好分析，偏重於財經政策的探討，並非系統性地分析中共財經官員。本文目的即在於彌補此項缺憾，嘗試以中共政權特性為由，解釋過去三十年來中共財經高官仕途流動的特徵與趨勢。

本文認為中共目前具有「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和「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兩種特性，這兩種政權特性也影響了菁英甄補的模式。鄧小平的改革路線是以國家力量推動以市場經濟為方向的現代化，因此呈現「發展型國家」的特性；同時又要保護現有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基本內涵，如一黨領導，所以保留了「後極權主義」的特性。本文以1978~2008年之間，258位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正副首長為對象，

探討上述兩種政權特性對財經高官甄補的影響。受到「發展型國家」的影響，財經高官的專業憑證(*professional credentials*)愈來愈重要，反映在研究生以上學歷程度者已成主體，具有經貿管理學科專業的比例愈來愈高，留學歐美的比例也逐漸提升，並以攻讀學位為主。同時，他們的仕途路徑出現「系統內流動」的特徵，以內升或相關宏觀經濟調控部門之間調任為主。不過，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與專業經濟部門、國有企業之間的調動管道仍然存在。另外，在「後極權主義」的影響下，中共黨籍仍是財經高官的基本政治憑證(*political credentials*)，同時隨著職務級別提升，具有專任黨職經歷的比例明顯提高。不過，入黨年齡已經不再是重要的政治憑證，反映中共用人標準向專業憑證妥協的結果。

本文共分為八個部分，第二節討論政權型態對菁英甄補的影響，並提出與專業憑證、政治憑證相關的六項研究命題；第三節探討財經高官的定義，說明研究設計與資料來源；第四節陳述財經高官在性別、族裔、年齡、出生地等方面的人口學特徵；第五節的重點在於分析財經高官在教育程度、學科專業及出國經驗方面的專業化趨勢，以便檢驗本文有關專業憑證的命題；第六節從財經高官的仕途發展情形，以探討財經部門高官是否出現「系統內流動」的現象；第七節分析財經高官的黨職、入黨年齡與黨職經歷，檢驗有關政治憑證的兩個命題。

貳、研究命題：政權型態對菁英甄補的影響

菁英甄補探討的研究範圍包含「取得菁英地位的資格」(*eligibility for elite status*)和「安排特定菁英職位」(*selection to specific elite positions*)兩個面向，均是政治體系的重要功能(Schwartz, 1969: 552; Seligman, 1961: 77)。具體的議題則包括甄補通道、挑選過程與關卡、甄選憑證(*credentials*)、菁英替換與繼承、菁英甄補對政權和政策的影響等(Putnam, 1976: 45-70)。政治甄補的結果反映了政治體系的主流政治價值觀，特別是甄選機構的偏好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影響力分布。政治甄補也凸顯某種甄補憑證或專業資源的重要性，影響政治參與和取得政治地位的通路，進而影響到政權穩定(Seligman, 1964: 612-613)。

政權型態會影響菁英甄補方式，而菁英被甄補到政權核心後，其作為又會影響政權的存亡。當執政者感受國內外環境出現變化，必須有所變革，政治菁英的甄補標準就會出現變化，以便讓更合適的人才進入決策中心。根據這個觀點，菁英甄補提供吾人觀察和評估一個政權特性與其未來發展方向的線索。基於菁英甄補和政權特性之間的緊密關係，本節首先提出當今中共政權具有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特性，接著說明這種特性對甄補財經高官產生的影響，並建立六項研究命題。

一、中共政權的特性：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

那麼，現階段中共政權的特性為何呢？從1978年以後的發展歷程來看，中共在兩條邏輯上同步並進：一條是「鞏固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另一條則是「促進市場經濟發展」。這種現象正代表中共政權具有「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Post-Totalitarianism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PTCDS)的特性。¹不論是後極權主義或是發展型國家的特性，都是為了延續中共統治而存在。²鄧小平的改革路線是在保存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前提下，以國家力量推動現代化。這種策略要掃除現代化障礙，如廢除幹部終身制、建立市場機制，又要保護現有體制的基本內涵，如一黨領導。鄧小平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解決這個變與不變的矛盾。³在相當程度上，「政左經右」一詞也是反

¹ 吳玉山認為，當今中共一方面出現「後極權主義」的特徵，如制度化、科技官僚統治、消費主義，與蘇聯東歐等共黨國家並無明顯差異；另一方面，中共又出現東亞式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與台灣、南韓等國的發展特性相近。一群受到政治領袖信任的優秀經濟官僚來主導國家的產業政策、操控市場，決定商業競爭的贏家。由於匯合後極權主義與發展型國家兩種特性，中共經驗分別和蘇東模式與東亞模式有相似之處，卻又不完全相同，使得中共經驗與眾不同。關於後極權發展型國家、發展型國家與後極權主義之間的異同，參見吳玉山（2007：309-335）。

² 裴敏欣(Pei, 2006: 7)的觀點與本文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中共遵循的是政治生存邏輯(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推動市場經濟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都是為了這個政權的政治生存。因此，改革只能在不違反執政菁英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進行。

³ 1987年趙紫陽以《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題，向十三大大會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並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通過新黨章，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正式載入黨章。

映這種變與不變的分際。⁴不過，「政左經右」是以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劃分變與不變的原則，與後極權發展型國家相近但稍有不同。後者涵蓋的領域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而且後極權主義、發展型國家在單一領域中都有交錯調和之處。鄧小平的兩大目標——「保存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與「推動現代化」——不僅形塑了中共黨國體制的特性，也影響到菁英甄補的過程。

面對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民生凋敝，鄧小平將黨的路線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確有值得效法之處，中共利用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擴展私營經濟部門，並在經過許多波折之後，逐漸建立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state capitalist economy*) (吳玉山，2003：1-31)。為了推動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共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並推動幹部四化政策，甄補年輕而教育程度較好的技術官僚。技術專家崛起因此成為改革開放的一大特色(Li, 2001: 25-50)。這些特性已經使得中共政權具有發展型國家的重要特徵，如以發展為取向的領導者、經濟技術官僚崛起、以國家力量推動私人經濟部門發展、國家自主性與弱化的市民社會、以高速經濟發展的政績做為政權合法性基礎等。⁵雖然中共與東亞國家的發展歷程仍有差異，但吾人不能否定兩者之間確實存在相似的地方。⁶

另一方面，中共政權兼具了後極權主義的特質。後極權主義可說是威權政權的一種特殊型態(Linz, 2000: 245-261)，或介於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的政權型態(Linz & Stepan, 1996: 42-51)，用來概括極權主義衰退後的政權特性。對蘇聯來說，這是後史達林時期；對中國來說，則是後毛澤東時期。首先，中共追求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狂熱被經濟發展的思維取代。從1987年十三大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2002年十六大「三個代表」寫入黨綱的歷史，

⁴ 此處所說政治上「不變」並非指涉「停滯」，而是說所有的政治改革方向都是為了強化或維持一黨領導方能存在。因此，多年來中共推動幹部四化、差額選舉、基層選舉、黨內民主、政務公開等各種政治改革議題，甚至連「四個堅持」中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來都改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皆顯示中共並非在政治面向一成不變。但只要可能影響一黨領導的試點就無法推展到全國，或不為中央層級單位採用（如黨代表常任制），甚至遭到停辦（如鄉鎮長直選）。

⁵ 關於發展型國家特性的討論，參閱Johnson(1999: 37-39)、Leftwich(1995: 400-427)、Onis(1991: 111-116)、Wu(2007: 979-980)。

⁶ 關於中共與東亞國家發展經驗的差異性，參見Baek(2005: 485-498)、Breslin(1996: 689-706)。

正好顯示中共意識型態轉變的過程。同時，整黨整風運動的強度與頻率也在1978年之後大為降低（王明高，2002：130-131）。領導人更替與集體決策也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前言回顧現有文獻時已提到此點，在此不再贅述。不過，中共拒絕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繼續壟斷人事任免權、國家暴力機器和傳播媒介。社會上，各類民間團體大量湧現，但中共仍然控制主要群眾團體，毫不留情地消除可能威脅其統治的社會力量，如打壓法輪功、逮捕簽署2008憲章的劉曉波。爲了合理化一黨專政，中共建構一套具有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理論。⁷行政革新、黨內民主等各種政治改革必須在一黨領導的框架下進行。這些現象都點出中共的後極權主義特性，如政治獨占（political monopoly）、經濟與社會的有限多元化、共產主義的烏托邦色彩衰退、集體領導的制度化，政治動員規模和頻率降低。⁸

後極權主義雖然是極權主義政權進入後革命時期的產物，但其內涵和極權主義已有相當差異。在上述後極權主義特性中，除了政治獨占的延續性很強以外，其餘皆與極權主義不同。⁹因此，後極權主義並非單純表示共黨政權始終不變，反而顯示政權的「變」與「不變」。許多學者都認爲中共具有後極權主義的特性，儘管他們使用的名詞可能有所不同，如退化的極權主義、行政吸納政治、後全能主義、新極權主義等（吳玉山，2007：309-335；李強，2001：77-85；李景鵬，2005：36-37；林佳龍、徐斯儉，2003：11-30；席曉勤、郭堅剛，2003：15-20；徐貴，2005：4-26；寇健文，2007b：1-28；康曉光，2002；蕭功秦，1999，2000，2002：82-88，2004：107-118；Kou, 2008）。吳玉山提出的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則被本文直接使用。由於菁英甄補與政治獨占的關聯性很高，接下來討論後極權主義的影響時，將偏重「不變」的面向。

⁷ 參見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 2007)發布的《中國的民主政治白皮書》與《中國的政黨政治白皮書》。

⁸ 關於後極權主義特質，參閱Linz與Stepan(1996: 42-51)、Lowenthal(1983: 200)。後者還從多元主義、意識型態、政治動員、領導體制四個面向說明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威權主義、蘇丹政權的異同(Linz & Stepan, 1996: 38-54)。

⁹ 政治獨占（一黨領導）包括黨管幹部、幹部享受利益與特權、黨控制決策過程、黨組織與國家機關緊密結合、黨組織督導國家機關、使用國家暴力壓制社會異議力量等，參見Kornai(1992: 33-48)。

二、政權特性對菁英甄補的影響

那麼，中共政權的二元特性對財經高官的甄補過程產生何種影響呢？根據前文對於後極權主義、發展型國家兩種特性來推論，中共在甄補財經官僚時，應該是一方面考量他們對政權的政治忠貞度，另一方面則強調市場經濟專業。但因維持政權仍為核心目標，幹部職務愈高時，對於政治憑證的考量會愈來愈重要。在前述後極權主義特性中，政治獨占對菁英甄補的影響最直接。政治獨占會使中共一方面抑制社會力量對其執政地位的挑戰；另一方面從體制內管道拔擢對政權效忠的新生代菁英。後者就涉及到中共甄補財經高官時採用的政治憑證。因此，本文以黨籍、入黨年齡、專任黨職經歷做為政治忠貞度的指標。

在發展型國家的特性中，「經濟技術官僚崛起」與政治甄補的關聯性最高。在計劃經濟時代，共黨政權就已經存在經濟技術官僚。Lowenthal曾指出，共黨政權建立後出現烏托邦(utopia)與發展(development)之間的兩難困境，這兩種國家目標優先順序的變動導致共黨內部爆發政策上的分歧，以及技術官僚、革命菁英地位的升降。¹⁰過去蘇聯和中共等共黨國家都曾面臨紅與專的論戰。不過，1978年以後中共極力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願意向西方吸收財經科技新知，同時將經濟體制逐漸轉型為市場經濟，與世界接軌。此時財經高官的專業憑證偏重「全球化下的市場經濟導向」，不同於早期「計劃經濟導向」的財經專業。因此，本文除了分析財經高官的最高學歷、專業學科之外，特別分析其留學經驗、職務歷練。

正是由於專業憑證需求出現本質性變化，維持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與促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之間出現可能的矛盾空間。當中共拔擢熟悉西方政經體制運作的菁英，促進經濟現代化之際，也要考量是否無意中讓同情西方民主政治的人擔任要職，成了西方和平演變中國的助力。這使得財經高官的仕

¹⁰ Lowenthal(1970: 33-116)指出，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念強調社會地位與物質待遇的平等，偏好利用犧牲奉獻、動員幹部民眾熱情的方式創造公共利益。但共黨政權皆建立在發展落後的國家，負有「後來追上」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任務，使得共黨政權又必須利用國家強制力量與物質誘因激發民眾生產能量。然而，強制力量與物質誘因又使得社會地位與物質待遇出現差別，如管理階層與勞動階層之分、薪資福利的高低之分。這種矛盾種下共黨政權的紅與專論戰的根源。

途發展出現「重視市場經濟專業下的政治優先」的現象，以滿足中共政權二元特性的需求。換言之，兩個政權中的任何單一特性，均無法充分解釋中共甄補這些高官時的標準。

根據上述觀點，本文提出四項與市場經濟專業憑證有關的命題，以及兩項與政治憑證有關的命題：

命題一：在全球化市場經濟的專業需求下，中共財經高官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比例應該愈來愈高，特別是具有博士學位者。

命題二：在全球化市場經濟的專業需求下，中共財經高官具有經貿管理專業的比例愈來愈高，理工等其他專業出身的財經高官則逐漸減少。

命題三：由於全球化市場經濟的專業需求較高，財經高官具有歐美留學經驗的比例理當愈來愈高，而且高於全國同級幹部中的比例；出國目的也以攻讀學位為主，而非短期進修講學。

命題四：由於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的重要性日增，財經高官逐漸形成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內調動的趨勢，既不容易與國務院非宏觀經濟調控部門交流，也很少到省級黨委和政府擔任領導職務，形成「系統內流動」。

命題五：多數財經高官不僅是中共黨員，而且在完成學業前後取得黨籍，不因大陸市場經濟發展程度而改變。

命題六：財經高官若不具備專職黨職歷練，向上晉升的難度很高，不因大陸市場經濟發展程度而改變。

參、定義、變項指標及資料來源

上一節指出政權特性與菁英甄補之間的緊密關係，並根據中共政權的後極權發展型國家特性推論出六項研究命題。接下來，本節的重點轉移到財經高官的內涵、被分析的變項，以及資料來源，這些都是在實證分析財經高官政治流動之前必須闡述的重點。

一、財經高官的定義

在本文中，財經高官的定義是「在1978年以後，被中共拔擢擔任國務院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正副領導職務的官員」。換言之，1978年以前就任，即使

任職期間超過1978年的財經高官都被排除在外。在此定義中，最關鍵的部分是「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內涵。依照職能和管理領域，國務院的部委行署分爲：（一）宏觀經濟調控部門；（二）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三）教育科技文化、社會保障和資源管理部門；（四）國家政務部門四類。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主要職責包括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完善經濟、法律手段；改善宏觀調控機制（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中央編委辦公室綜合司編，1998：11-14；浦興祖編，1999：370-371；楊光斌，2003：133-134）。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等四個單位都屬於宏觀經濟調控部門。

另外，參考國務院各單位的職權，以及國務院機構整併歷程，其他與宏觀經濟調控有關的部門還包括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這些單位的職掌領域和宏觀經濟調控有關，合乎「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範疇，接下來分別說明原因。

爲了加強對金融業的管理，中共在1992年10月、1998年11月先後將證券和保險的監管職能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成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保監會），而銀行監管和制定貨幣政策兩大職能仍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¹¹爲了加強國際接軌、對銀行業的監管、防範金融風險，規範金融市場秩序，同時爲了使中國人民銀行更獨立地行使貨幣政策職能，中共在2003年4月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再將制定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職能分開（顧錢江、王立彬、常曉華，2003）。由此可知，由中國人民銀行、銀監

¹¹ 1992年成立證監會時，中共同時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簡稱證券委），與證監會共同負責證券管理。證券委的任務是加強證券市場的巨集觀管理，統一協調股票、債券、國債等有關政策，保護人民群眾利益。證券委主任由總理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財政部、經貿辦、監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經貿部、國家工商局、國家稅務局、國家國有資產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等十三個部委的負責人擔任委員。由於證券委的位階高於證監會，證監會在成立之初只是副部級機構。1998年4月證監會與證券委合併，並升格爲正部級事業單位，專司全國證券、期貨市場的監管職能（參見〈中國證監會簡介〉，2006：中央政府門戶網站；〈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2006：中國網）。

會、證監會與保監會構成的「一行三會」都是負責大陸金融管理工作的單位（溫源，2003）。另外，國務院在2003年3月設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授權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國資委整合了原屬於國家經貿委指導國有企業改革和管理的職能、中央企業工委的職能，以及財政部有關國有資產管理的部分職能，負責所有的國有企業及其所屬的國家資產之監督、改革、考核、管理，因此也屬於宏觀經濟調控部門。¹²

至於國務院的專業經濟管理部門，如鐵道部、交通運輸部、農業部、水利部、工業和資訊化部等，均不在本文分析範圍之內。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主要職責在於制定行業規劃和行業政策，進行行業管理；引導本行業產業結構的調整；維護行業平等競爭秩序（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中央編委辦公室綜合司編，1998）。但這些部門並不負責國家總體經濟事務，因此它們的正副首長不應視為本文所指的財經高官。

由於本文觀察的菁英流動時間涵蓋三十年，勢必將部分已被裁撤或合併的國務院部門一併納入分析範圍。1978~2008年間，中共國務院一共進行六次機構改革。¹³本文參考中共發布的官方文件，對照各部門職權轉移情形，歸納出應該納入分析的單位，這些單位包括國家計畫委員會（1952~1998年）、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1998~2003年）、¹⁴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1982~1998年）、¹⁵商業部（1952~1993年）、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1993

¹² 參見國資委官方網站(<http://www.sasac.gov.cn/n1180/n1196/n3145/n5738/index.html>)、〈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2003年）〉，2003：新華網。

¹³ 這六次機構改革的發生時間分別是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及2008年。參見楊立杰、谷玥(2003)。

¹⁴ 計劃經濟時代最具財經實權的國家計畫委員會，在1998年更名為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職權性質由綜合經濟部門改組為宏觀調控部門。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後者不再審批投資項目，投資行為全靠市場機制。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是國務院負責研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目標、長期規劃、總量平衡的宏觀調控部門。中共在2003年將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¹⁵ 1982年5月設立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體改委）是研究、協調及指導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綜合性專門機構。體改委會一度執掌經濟體制改革大權，不過在1998年3月的機構改革中，體改委縮編為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原體改委改為國務院高層次的議事機構，總理兼任主任，有關部長任成員，不再列入國務院組成部門序列。新的體改委未被本文列為宏觀經濟調控部門。2003年時撤銷體改委，其改革職能併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經濟發展職能則併入新成立的商務部

～2003年)、國內貿易部(1993～2003年)、¹⁶對外貿易部(1952～1982年)、對外經濟聯絡部(1952～1982年)、對外貿易經濟部(1982～1993年)、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1993～2003年)。¹⁷現有國務院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往往是這些部門多次整併之後的產物, 掌管的職權也可以回溯至這些部門當初的業務。

二、變項指標與資料來源

爲了檢驗前一節提出的六項命題, 本文以五年爲一個單位, 將1978～2008年分成六個時段, 分別是1978～1982年、1983～1987年、1988～1992年、1993～1997年、1998～2002年、2003～2008年, 觀察財經高官基本特徵的變化。每一個時段大致以國務院換屆改組的那一年爲起點, 中共召開次屆黨大會那一年爲終點。如此一來, 本文可以檢驗財經高官專業憑證與政治憑證的重要性是否出現變化, 以及變化趨勢。其中, 1988年的機構改革首次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之觀點, 開始弱化專業經濟部門直接干預企業的職能, 以達到增強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轉向行業管理目的的改革(楊立杰、谷玥, 2003)。1998年的機構改革撤銷幾乎所有的工業專業經濟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正式成立〉, 無日期: 改革開放30年論壇)。體改辦的主要職責是對改革開放的調查研究、諮詢建議、方案論證、跟蹤回饋的職能, 不再承擔各部門體制改革方案制定和指導改革方案的具體實施工作, 不再負責指導、協調各類改革開放的試點, 不再組織制訂有關經濟法規。(〈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簡介〉, 2004: 新浪網)。由於本文著重的是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決策職權, 體改辦僅具有調查研究職權, 因此本文未將體改辦列入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其他宏觀調控部門也有調查研究職能, 如保監會設有政策研究室、證監會設有研究中心、人民銀行設有研究局及調查統計司等, 但關鍵在於這些部門都還有參與制訂經濟政策、法規的權力, 才被納入宏觀經濟部門的範圍。

¹⁶ 在國內貿易部分, 1982年中共將原有的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及糧食部合併, 設立新的商業部。1993年4月撤銷商業部、物資部, 組建國內貿易部。同時, 中共成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統整貿易事務, 負責制訂產業政策、調節短期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部門。

¹⁷ 在國外貿易部分, 1982年3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合併, 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1993年3月, 對外經濟貿易部更名為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 爲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後, 中國與全球市場將融爲一體, 很難繼續區分內貿和外貿。2003年中共將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內負責貿易的部門和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合併成商務部, 統一負責國內外經貿事務(張毅, 2003)。

部門，向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目的邁進一大步。可以說，1987年以前的機構改革並未觸及計劃經濟的核心體制，1988~1997年之間則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摸索過渡期，1998年之後大陸市場經濟體制快速發展，並與世界經濟緊密接軌。

本文的變項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人口學特徵，包括出生年月、性別、族裔、出生地，若資料未註明籍貫與出生地不同者，以籍貫為出生地。第二類是專業憑證的指標，包括最高學歷、專業學科、留學經驗及職務歷練。研究菁英甄補與社會流動的學者多半以最高學歷（或大學學歷）、學科專長做為專業憑證的指標，可說是強調教育的功績制(meritocratic emphasis on education)(Walder, 1995: 312-314; Zang, 1998: 45-52, 2001: 66, 2004: 5-9; Zhou, 1995: 449)，而本文新增留學經驗做為專業憑證的指標。1978年以後中共進行市場經濟轉型，此時財經官員的專業性應該偏重全球化下的市場經濟，中共大量派遣留學生出國進修，吸收西方科技經管新知，留學經驗因此成為新的專業憑證。

最高學歷分為五等級：中學（中專）以下、大學專科、大學本科、碩士研究生學歷（含碩士學位）、博士研究生學歷（含博士學位）。本文預期財經高官的學歷會愈來愈高，以研究生以上學歷為主（見命題一）。在專業學科方面，本文依照李成(Li, 2001: 74)的作法，將學科分為四大類別：工程與自然科學（如工程、物理、化學、機械、生物等）、經濟與管理（如經濟、貿易、會計、統計、管理等）、社會科學（如法律、政治、新聞等）、人文學科（文史哲、教育、外語等）。本文預期財經官員的學科訓練將更加集中於經貿管理，其他學科背景者將會減少（見命題二）。

在出國經驗方面，本文將檢驗財經高官具有國外留學經驗的比例，並分析他們的留學國家與出國目的。留學國家分為三類，分別是歐美等民主國家、蘇聯東歐等共黨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出國目的則分為攻讀學位（學士、碩士、博士）、進修受訓及講學研究等數類。由於歐美國家是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本文預期財經高官當中曾經前往歐美國家留學（滯留國外至少3個月以上）的比例將逐漸增加。¹⁸由於財經專業需要較長期的培養，本

¹⁸ 李成將海歸派定義為停留國外至少一年以上的學人，但本文採用寇健文的定義，將停留時間降為3個月，其目的在於觀察不同出國目的的學人在仕途發展上是否出現

文也預期具有留學經驗的財經高官應多為攻讀學位，進修受訓和講學研究者較少（見命題三）。

此外，學徒制(apprenticeship)——長期在性質相近的部門任職，讓原本不熟悉業務的幹部逐漸成為這個領域的專才——是培養專業憑證的另一種方法。這種實務歷練搭配專業學科訓練，可以強化專業能力，甚至讓專業學科訓練較弱的幹部磨練出專業能力。因此，本文將檢驗財經高官的晉升是否出現「系統內流動」的現象。同時，由於較難找出系統而有效的政績指標，觀察財經高官的職務歷練在某程度上彌補這個缺陷。

本文以「擔任第一個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副部級職務」為分界點，登錄財經高官任職前的最後五個主要職務，以及調職後至退居二線（即不再擔任黨務或政府專職）前的所有主要職務，做為觀察「系統內流動」的指標。¹⁹其次，本文將這些職務經歷區分為「全為宏觀調控部門」、「宏觀調控部門為主」、「宏觀調控部門為輔」及「全非宏觀調控部門」等四類，以便觀察財經高官工作單位的主要屬性。

另外，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領導職務經常交叉任職，無法區分主要和從屬職務，如國務院副總理也是政治局委員，總理必定是政治局常委。因此，追蹤財經高官仕途發展時，對於同時是政治局和國務院領導班子成員的人，不再細分職務屬性，一律定性為屬於宏觀經濟調控相關職務。但若同時擔任政治局委員和省級地方首長，則以地方首長為其職務屬性，不將其視為在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工作。²⁰部分黨中央或國務院領導人從未擔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正副首長，不符合本文對財經高官的定義，因此他們擔任的領導人職務將不被視為與宏觀經濟調控有關。²¹本文預期財經高官的主要來源是政府宏觀

差異(Li, 2005a: 3, 2005b: 83; Kou, 2008: 9)。

¹⁹ 由於部分財經高官人事資料不全，僅有歷任職務而沒有任職起迄時間，本文無法以就任前的特定期限為標準，如首次擔任副部級財經領導職務以前十年的經歷，分析財經高官內升的比例，只能採取分析歷任職務的權宜作法。另外，中共行政體制複雜，外界不易分辨特定職務的級別，本文無法將分析焦點集中在局級職務。本文設定的五項職務通常能涵蓋財經高官所有的局級職務和一部分處級職務，視個人經歷複雜度而定。

²⁰ 財經高官中無人擔任過國家正副主席、軍委正副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等黨政領導人職務，因此並未額外說明。

²¹ 舉例來說，同時擔任國務委員（或副總理）和國防部部長（或公安部部長、外交部

經濟調控部門所屬單位的主管，他們的晉升管道也以這類單位為主（見命題四）。

第三類變項則用來檢驗有關財經高官政治憑證的三項命題，包括黨籍、入黨年齡及專職黨職經歷。研究社會流動或菁英甄補的學者通常以黨籍和黨齡做為政治忠貞度的指標，黨籍適合做為政治憑證的原因是入黨本身就需要經過政治考核程序，黨員身分又會影響重要職務的派任(Walder, 1995: 312-314)。有的學者則認為絕大多數黨政領導幹部均為中共黨員，而黨齡代表黨員經過多年組織活動後累積的政治資本與組織技巧，比黨籍更適合做為政治忠貞度的指標(Zang, 2001: 66, 2004: 5; Zhou, 1995: 449-450)。本文使用的入黨年齡與黨齡雖然不同，但前者代表黨員不具有黨籍的年限，與後者關聯性甚高。將專職黨職設定為第三個政治憑證則是根據黃信豪的研究而來，²²由於黨是中共政權的核心，具有專職黨經歷的幹部被中共認為是政治上更可靠的菁英群體。

前一節曾經提及，1978年以後中共雖然追求經濟現代化，但也要保持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基於這種後極權主義的特性，財經高官在專業性提高的同時，政治憑證仍應是晉升時的重要依據。因此，本文預期他們不僅絕大多數都是中共黨員，而且應該多是政治積極分子，在完成高等教育前後取得黨籍。這種現象並不因中國大陸市場經濟逐漸成熟，以及強調財經高官專業性而出現變化（見命題五）。

在本文中，專職黨職經歷特指全職的黨務部門主管，包括組織、宣傳、統戰、紀檢四大系統相關部門主管，以及地方黨委正副首長。因此，兼任性質較強的黨職（如國務院部委首長兼任的部委黨組書記）和非主管黨職（如中共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等）均不列入黨職經歷。本文預期，財經高官若不具備專職黨職歷練，向上晉升的難度會隨著職務級別提高而加大。由於財經官員存在「系統內流動」的現象，他們出任重要黨職的機會不大，也很少接掌省級黨政領導職務，晉升為黨政領導人的管道也隨之縮小（見命題

部長)的官員都不算是財經高官。

²² 黃信豪(2008: 190-193)分析1978~2008年之間中共正部級幹部流動之後指出，在政府工作的政治菁英具有黨職經歷的比例愈來愈高、愈早取得黨職經歷的菁英愈容易獲得晉升機會、愈快取得黨職經歷者，離職風險則相對降低。

六)。由於黨仍然是中共政權的核心，黨職的重要性不會隨著時間變化而出現差異，這種強調黨職經歷的甄補偏好反映中共重視政治憑證的具體表現，是直接影響幹部晉升與否的一大關鍵。

討論完使用的變項之後，接著說明資料來源。本文參考的書面資料主要來自各種主要人名錄與組織史資料，²³網路資料來源則是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人民網(<http://www.xinhuanet.com>)、作者籌建的「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中國軍政社區網站(<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index.php>)，以及國務院各部委官方網站公布的財經高官簡歷。這些書面和網路資料來源提供大部分官員簡歷，但部分官員個人資料仍不完整，此時以Google(<http://www.google.com>)、百度(<http://www.baidu.com>)等搜尋引擎搜尋資料，同時進行個人資料的更新或補充，若書面資料與網路資料不同之處，均以官方出版的書面資料為準。網路搜尋時若遇到同名同姓的人物資料時，則依照現有可信的簡歷內容，人工判斷是否為名單上的財經高官。儘管如此，部分財經高官的簡歷仍有不完整之處，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

肆、財經高官的人口學特徵

經過繁雜的搜尋與建檔，至2008年8月為止，一共找到258位符合本文定義的財經高官，另有23位財經高官是在1978年以前就任，任職期間超過1978年，並不符本文「1978年以後被拔擢擔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正副領導職務」的定義，因而被排除。²⁴接下來的四節依次描述這258位的人口學特性，以

²³ 如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0)；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04)；中共研究雜誌社(2006)；何虎生(2003)；Radiopress(1978~2007)。

²⁴ 這些人分別是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鄧東哲(1970/6~1978/9)、段雲(1973/5~1982/4)、李人俊(1973/5~1982/4)、顧秀蓮(1973/7~1982/6)、金殿英(1977/7~1984/9)、張根生(1977/7~1978/1)、徐良圖(1977/7~1978/6)、馬儀(1977/7~1978/3)、張衍(1977/7~1978/7)；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丁冬放(1959/4~1983/6)、李紹禹(1959/4~1983/6)、方皋(1959/4~1983/6)、袁子揚(1965/1~1983/6)、蔣明(1975/1~1983/6)、耿道明(1975/1~1983/6)；財政部副部長王學明(1954/9~1983/6)、杜尚先(1959/4~1983/6)、江東平(1965/1~1983/6)；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

及專業憑證、系統內流動、政治憑證等相關命題。

一、性別、族裔、出生地分布

在人口學特性方面，本文敘述中共財經高官的性別、族裔、出生地、年齡分布趨勢。此部分雖與研究命題無直接關係，但有助於瞭解財經高官群體的基本特徵，因此本文花了較短篇幅描述。不令人意外地，男性構成財經高官的主體，占全體的95.0%，女性僅占5.0%（參見表一）。若和全國省部級幹部的女性比例相較，女性財經高官的比例略低於全國女性高官的比例。在1981~1998年之間，每年女性在省部級幹部的比例從3.80%逐漸增加到1998年的7.2%，而且在1993年以後就未低於7%（中共中央組織部，1999：4）。在族裔方面，漢族具有絕對優勢，258位財經高官當中只有4人是少數民族（滿族3人、蒙古族1人），僅占1.6%，其餘均為漢族（參見表一）。在1981~1998年之間，每年少數民族在全國省部級幹部中的比例介於5.42%~9.27%之間（中共中央組織部，1999：5）。另根據2000年中國官方資料庫的數據，少數民族約占總人口的8.47%（白樺，2004：541）。由此可見，少數族裔在財經高官中的比例不但低於其在全國人口的比例，也低於其在全國省部級幹部中的比例。

若以出生地來看，財經高官主要來自華東地區(46.8%)和華北地區(18.1%)，兩者合計六成五。華中地區和東北地區各有十分之一左右，來自華南、西南、西北三個區域的比例很低，共占總人數的9.2%（參見表一）。這樣的分布狀況和中共第四世代政治菁英群體、歐美海歸派高官或是科技菁英的分布情形極為類似。根據李成的研究指出，不論是省級領導人、高階軍事將領或是第四世代領導人（華東和華北兩地區占49.8%），都是由來自沿海省分的菁英占據主要職務(Li, 2001: 59-62; 2005a: 3)。寇健文(2007b: 8)指出，現任歐美海歸派高官有46.7%來自華東地區，16.4%來自華北地區，合計63.1%。曹聰(Cong Cao)研究中科院、中國工程學院院士的出生地後發

(1973/11~1981/9)、副部長陳潔(1973/11~1982/3)、劉希文(1977/3~1982/3)、王潤生(1977/3~1982/3)、鄭義山(1977/3~1982/3)。

表一 財經高官的人口學基本特性

基本特徵		樣本數(N)	百分比(%)
性別	男	245	95.0%
	女	13	5.0%
族裔	漢族	254	98.4%
	少數民族	4	1.6%
出生地	華北地區	45	18.1%
	東北地區	28	11.3%
	華東地區	116	46.8%
	華中地區	27	10.9%
	華南地區	4	1.6%
	西南地區	10	4.0%
	西北地區	9	3.6%

說明：1. 華北地區包括河北、北京、山西、內蒙古、天津；東北地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華東地區包括江蘇、上海、浙江、山東、福建、安徽、江西；中南地區包括河南、湖北、湖南；華南地區包括廣東、廣西、海南；西南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西北地區包括陝西、寧夏、甘肅、青海、新疆。其中9人出生地不詳，未包括在內。
2. 百分比計算至小數點下第一位，由於四捨五入，加總可能不為100%。以下各表均同，不另做說明。

現，來自華北和華東各省的科技菁英超過全體的四分之三以上，²⁵他認為這些省市較早對外開放，民眾較早接觸新觀念，經濟發展帶來更好的教育機會。同時，崇尚教育的人文環境與人才輩出的歷史淵源也有關聯（曹聰，2007：129）。

財經高官之所以高度集中於華東地區和華北地區，與地方經濟發展程度、政治中心位置、歷史文化均有關聯。如江浙地區自古就是魚米之鄉、商業重鎮，此地人民的教育程度、進修機會皆要比其他地區來得高，出國留學的機會也較多，又是改革開放政策的最大受益地區，自然容易孕育出大量財經管理人才。華北地區則有北京和天津兩大城市，前者是數百年來的政治中心，後者則在清朝以後逐漸發展為北方工商業重鎮，這種歷史背景也導致當地民眾較有機會進入仕途。

²⁵ 本文根據曹聰的資料統計各地區的科學菁英人數，參見曹聰(Cao, 2004: 75)、Cao與Suttmeier(1999: 542)。

二、年齡分布

在年齡分布方面，表二顯示過去三十年來財經高官首次就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副部級職務時的年齡分布及變化趨勢。首先，平均年齡逐漸下降，從1978~1982年期間的60.0歲降到2003~2008年期間的52.4歲。超過60歲才出任財經高官比例從1978~1982年期間的46.9%，迅速降到1983~1988年的0%，此後二十年從未超過一成，顯見中共在1980年代以後建立幹部退休制度的成效。

表二 副部級財經高官就任時的年齡分布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66歲以上	10	15.6%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10	3.9%
61~65歲	20	31.3%	0	0.0%	3	9.1%	2	4.5%	3	7.9%	0	0.0%	28	11.0%
56~60歲	17	26.6%	9	37.5%	12	36.4%	12	27.3%	11	28.9%	13	25.5%	74	29.1%
51~55歲	8	12.5%	13	54.2%	10	30.3%	19	43.2%	10	26.3%	23	45.1%	83	32.7%
46~50歲	7	10.9%	2	8.3%	6	18.2%	6	13.7%	8	21.1%	13	25.5%	42	16.5%
41~45歲	2	3.1%	0	0.0%	2	6.1%	5	11.4%	6	15.8%	2	3.9%	17	6.7%
小計	64	100.0%	24	100.0%	33	100.1%	44	100.1%	38	100.0%	51	100.0%	254	99.9%
平均年齡	60.0		54.0		54.1		52.8		53.0		52.4		53.9	

說明：1. 本文以其首次擔任副部級宏觀經濟調控部門領導職務時的年齡為準。

2. 分析對象中，有4人資料不全，另有22人在擔任財經領導職務前就已是正省部級以上的幹部。若1978年以前就已是副部級以上的財經高官，依照其初次擔任副部級財經職務的年齡計算。若遇有資料不完整者，則以其在1978年的年齡為基準計算。

儘管財經高官的年輕化出現明顯成效，不到45歲就出任副部級財經領導職務的人卻不多見。舉例來說，41~45歲之間被拔擢為副部級財經高官的人多半低於6.1%，只在1993~2002年間超過10%。這使得財經高官首度就任的年齡層逐漸向46~60歲集中，除了1978~1982年間僅有五成以外，其餘各時段均超過三分之二，而且多半高達八成五以上。

與全國省部級高官相較，財經高官年輕化的速度快了許多。1981~1998年之間，全國省部級幹部當中60歲以上的比例從八成以上降至五成四（中共中央組織部，1999：6），但在財經高官的群體中，超過60歲才擔任副部級財

經領導職務的比例自1983~1988年期間開始就維持在9.1%以下。這應該是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具有強烈的專業化需求，導致淘汰革命世代幹部的步伐也較其他黨政部門來得快。換言之，財經高官快速年輕化的現象是與下一節討論的專業化議題密切相關。

伍、財經高官的學歷背景

前一節描述財經高官的人口學特性之後，本節接著從學歷、專業學科及留學經驗等三個面向檢驗其專業化程度，結果將檢驗本文前三項命題，進而回答中共財經高官的專業性是否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與全球化而提高。

一、學歷

從表三可以看出，過去三十年來，財經高官的學歷逐漸提高。在1978~1982年間，中學以下學歷者占46.2%，大專學歷占26.9，兩者合計73.1%。大學以上學歷共占26.9%，其中碩士生以上學歷者僅有1人，占1.9%。自1980年代初期中共推動幹部四化政策之後，短短的五年之內中學以下學歷的財經高官幾乎完全消失。在1988年以後，只有一人能夠以中學（中專）學歷的教育程度出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領導職務——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²⁶大學本科學歷則成爲主體，占該時期財經高官的54.5%，大專學歷則有31.8%，碩士生以上學歷僅有1人，占4.5%。這種大學本科學歷爲主體、專科學歷居次的結構在1988~1992年間繼續存在，而且大學本科學歷的比例更高，達到三分之二。不過，研究生學歷的比例已經開始增加。

²⁶ 張平於2005年8月被任命爲發改委副主任，2008年3月又晉升爲正部級的主任。中學時期的張平曾經在安徽銀行學校信貸專業學習三年，長期在地方政府部門擔任財經職務，如中國人民銀行巢縣支行夏閣營業所會計、縣支行信貸員、副股長、股長、貿辦公室幹事，又歷練巢縣工商局副局長、安徽省計委主任，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他在安徽常務副省長任內領導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獲得成功，展現具體政績（田文生，2008）。再加上他的誠實風格，不會利用手中權力，獲取更高的（在職）學歷，這些特質讓他成爲少有的低學歷財經高官（趙丙臣，2008）。

表三 財經高官的學歷分布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中學以下	24	46.2%	2	9.1%	0	0.0%	0	0.0%	0	0.0%	1	2.0%	27	11.4%
大學專科	14	26.9%	7	31.8%	7	21.2%	10	22.7%	4	11.1%	1	2.0%	43	18.1%
大學本科	13	25.0%	12	54.5%	22	66.7%	26	59.1%	17	47.2%	14	28.0%	104	43.9%
碩士生	1	1.9%	0	0.0%	3	9.1%	7	15.0%	10	27.8%	21	42.0%	42	17.7%
博士生	0	0.0%	1	4.5%	1	3.0%	1	2.3%	5	13.9%	13	26.0%	21	8.9%
小計	52	100.0%	19	99.9%	33	100.0%	44	100.1%	36	100.0%	50	100.0%	237	100.0%

說明：1.以財經高官首次就任副部級宏觀經濟調控部門領導職務的年份為計算基礎。
 2.258人中有21人資料不全，未列入計算。
 3.碩士生含碩士與碩士研究生學歷，博士生則包括博士和博士研究生學歷。

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大學本科學歷的比例迅速下降，從1993~1997年間的59.1%持續下降到2003~2008年的28.0%。大學專科學歷的比例也快速下降，從1993~1997年間的22.7%下降至2003~2008年間的2.0%。近五年來，財經高官中只有現任銀監會副主席郭利根的學歷是大學專科。²⁷另一方面，博士與碩士研究生學歷快速增加，碩士生從1993~1997年間的15.0%激增至2003~2008年間的42.0%；博士生則從2.3%提高到26.0%。也就是說，在1998~2002年間，有一半以上的財經高官具有研究生學歷，五年之後研究生學歷的比例已經超過三分之二。

從以上討論可以發現，當中共決定推動幹部四化政策，以便執行改革開放路線以後，財經高官的學歷在幾年之後迅速提升到以大學本科學歷為主，中學以下學歷的幹部則被淘汰。1992年鄧小平南巡解決黨內姓社姓資的爭議之後，中共十四大確立經濟發展目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後，具有研究生學歷的財經高官比例開始快速增加，從不到兩成增加到四成，再增加到近七成。因此，命題一成立。

若與全國省部級幹部相較，財經高官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比例遠高於全國的比例。在1995~1998年間，全國省部級高幹中具有碩博士研究生學歷的比例從6.8%上升至11.8%（中共中央組織部，1999：5），²⁸但在1993~1997年

²⁷ 他從1984年起就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長達二十年，2003年起轉往銀監會工作，並於2005年12月擔任銀監會副主任。

²⁸ 1994年以前，該書將大學本科與研究生學歷合併計算，1995年後才將兩者分開列計。

間，財經高官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比例共占18.6%。由於財經高官高學歷化的速度高於全國，可見前者學歷的提升並非單純是中共恢復高校教育、發展研究生教育的結果，而有刻意篩選的因素在內。換言之，財經部門面臨的專業挑戰迫使中共加速這些部門高學歷化。

二、學科專業

此外，財經高官學科專業的分布趨勢也符合本文命題二。根據表四，在1978~1982年間，被任命的財經高官中許多人只有中學以下學歷（52.2%），另外具有自然工程與經貿管理學科專業的財經高官各占約五分之一左右。當中共開始實施幹部四化之後，官員學歷隨之提升。在1997年以前，經貿管理專業背景的比例逐漸增加，但始終未超過自然理工專業背景的比例。到了2003~2008年間，經貿管理專業背景的比例躍升至六成，自然科學專業背景的比例則降至16.7%。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背景（主要是法律和語言專業人才）的財經高官人數一直不多，所占比例也不高；近十年來所佔比例略有提升，介於20%~23%之間。

表四 財經高官的學科專業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自然工程	10	21.7%	10	45.5%	18	56.3%	21	48.8%	13	38.2%	8	16.7%	80	35.6%
經貿管理	9	19.6%	8	36.4%	13	40.6%	19	44.2%	13	38.2%	29	60.4%	91	40.4%
社會科學	0	0.0%	0	0.0%	0	0.0%	1	2.3%	3	8.8%	4	8.3%	8	3.6%
人文學科	3	6.5%	2	9.1%	1	3.1%	2	4.7%	5	14.7%	6	12.5%	19	8.4%
其他	24	52.2%	2	9.1%	0	0.0%	0	0.0%	0	0.0%	1	2.1%	27	12.0%
小計	46	100.0%	22	100.1%	32	100.0%	43	100.0%	34	99.9%	48	100.0%	225	100.0%

說明：1. 以財經高官首次就任副部級宏觀經濟調控部門領導職務的年份為計算基礎。

2. 258人中有33人資料不全，未列入計算。

3. 「其他」一類包括中學以下或無特定專業主修者，其中有2位中學（中專）以下學歷者歸類以較特別。一位是中學土木專業的彭敏，另一位是在銀行學校學習的張平，本文仍將他們歸類在「其他」。

這些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出身的財經高官有些是法律專才，有些則是語言專業出身。前者如高西慶為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法律博士，在美國律師事

務所執業十年，1992年歸國後擔任中國證監會首席律師，1999~2003年間擔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又如史美倫是美國加州聖達嘉娜大學法律博士，長期在美國法院、律師事務所工作，之後在香港證監會擔任要職，於2001~2004年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張茅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歷任北京玻璃總廠黨委副書記兼北京玻璃器皿廠廠長，黨委書記兼副廠長、北京市一輕總公司副經理、中共北京市委對外經貿工委委員、市對外經貿委副主任、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管委會主任等職務。

語文專業出身的財經高官多半長期在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或國有企業工作，如姜增偉是英語專業，但在商業部、國內貿易部等財經單位工作二十年，2005年起擔任商業部副部長。魏建國則是法語專業，1973年起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所屬機構與駐外單位工作三十年，最後於2003~2008年間擔任商務部副部長。又如吳小平在1968年畢業於上海外語學院，之後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工作二十五年，在2003~2006年間擔任中國保監會副主席。

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大陸市場化程度提高，與全球接軌的程度愈緊密，政府管理經濟活動的專業性隨之提高。在這種背景下，中共任命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領導幹部時，更偏好經貿管理學科專業的官員。過去中共大量倚賴修習自然科學的官員，形成所謂的「工程師治國」，但他們不一定受過財經相關學科訓練，而現在必須仰賴更具專業知識、更有實務經驗的財經官員，規劃經濟發展方向，由此可以看出國家發展目標對菁英甄補的影響。

三、國外留學經驗

本文命題三指出，由於專業需求較高，財經高官具有歐美留學經驗的比例理當愈來愈高，出國目的也以攻讀學位為主，而非短期進修講學。如命題三所述，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方向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向市場經濟最發達的西方國家學習經驗是常見的作法。在這種情形下，曾經前往西方國家留學的海外學人就有較強的專業知識與訓練，比較容易受到中共青睞，擔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領導職務。

根據表五顯示，在258位財經高官當中，一共有40人具有海外留學經驗，占全體的15.5%。雖然財經官員中的海歸派不多，但是在過去三十年以

來，除了1993～1997年間海歸派比例下滑之外，其餘呈現穩定的上升趨勢，印證命題三的論點。在過去十年之間，海歸派人數已占同時期全體財經高官的四分之一左右，同時，目前海歸派在全國省部級以上幹部中的比例僅約占5%～10%（寇健文，2007b：9），海歸派在財經高官的比例已經是他們在全國高幹中的兩倍。基於此項觀察，本文認為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對市場經濟的專業需求是海歸派比例較高的主因。具體例證是前文提到的史美倫和高西慶兩人，史美倫更是中共首次從境外（香港）甄補的副部級高官。至於財經高官的海歸派人數、比例未來是否會繼續增加，目前還無法定論。²⁹

表五 財經高官的出國留學經驗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第一世界	1	20.0%	1	25.0%	1	17.0%	2	50.0%	9	100.0%	9	75.0%	23	57.5%
第二世界	4	80.0%	3	75.0%	5	83.0%	2	50.0%	0	0.0%	0	0.0%	14	35.0%
第三世界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3	25.0%	3	7.5%
小計	5	12.5%	4	10.0%	6	15.0%	5	12.5%	9	22.0%	12	30.0%	40	15.5%

說明：1. 以財經高官首次就任副部級宏觀經濟調控部門領導職務的年份為計算基礎。

2. 國外留學經驗包括攻讀學位、講學研究。

3. 小計一欄的百分比為海歸派占該時期所有財經高官的比例。

此外，財經高官的留學國也出現明顯變化。1992年以前，海歸派財經高官是以留學第二世界（蘇俄、東歐等共產國家）為主，所占比例均在四分之三以上，這是因為在1960年代以前，中共派遣大量留學生至其他共產國家攻讀學位或實習，這批留學生在1980年代後陸續晉升至副部級以上職務。1990年代初期以後，這批幹部大量屆齡退休，而1970年代以後留學西方國家的歸國學人人數開始增加，財經高官的主要留學國家隨之轉以第一世界（歐美日等民主國家），³⁰這種留學國的轉變只是反映改革開放後的整體大環境。

²⁹ 主要原因在於用來觀察的時段過短，無法確定未來走勢。中共向西方大量派遣留學生是從1978年開始，但要到了1992年當時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提出「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方針之後，中共留學政策才穩定下來，歸國學人人數隨之逐漸增加。從1992年迄今僅16年，但海歸派自學成回國至晉升為副部級幹部平均需要11.7年（寇健文，2007b：13）。

³⁰ 近五年出現3位是留學第三世界國家的財經高官，成為例外情形。馬德倫赴新加坡

最後，若從出國目的來看，財經高官出國留學多以攻讀學位為主，包括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共22人，占財經高官中具有海歸經驗人數的五成五，以訪問學者和短期受訓為出國目的的財經高官僅占四成五。不過，以全國海歸派高官來看，訪問學者和短期受訓的比例是62.4%，攻讀學位者反而較少(Kou, 2008: 13)。由於攻讀學位滯留國外時間較長，吸收西方經濟知識的效果也較好，顯見中共在甄補財經高官時，專業需求確實是一大考量因素。

陸、財經高官的系統內流動

以下本節將分析財經高官的歷練情形，以便檢驗命題四有關「系統內流動」的正確性。「系統內流動」意指隨著中共市場化與全球化程度提高，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專業挑戰也增加，強烈的專業需求使得財經高官逐漸形成內部調動的現象。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和國務院其他部門之間很少出現幹部交流，也很少和省級黨政領導班子之間進行幹部交流。以下本文將從財經高官「就任前的職務歷練」和「調職後的仕途發展」兩方面檢驗「系統內流動」的命題。

一、就任財經領導職務前的職務歷練

從表六可以看出，財經高官擔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副部級領導職務以前，最後五項職務均在這類部門的比例從1978~1982年間的20.0%逐漸提高，在最近十年間均維持在35%~37%左右。職務歷練以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為主的比例變動較大，從1978~1982年間的29.2%開始下降，在1988~1992年間到達最低的9.1%，其後又開始上升，自1998~2002年間以後就維持在四分之一強。總體來看，自1990年代末期起，財經高官就任前的最後五項職務集中在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全為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或「以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為主」兩類）的比例已經超過66%。

表六 財經高官就任前的工作部門屬性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全為宏觀經濟 調控部門	13	20.0%	6	24.0%	8	24.2%	10	23.3%	13	35.1%	19	37.3%	69	27.2%
以宏觀經濟調 控部門為主	19	29.2%	4	16.0%	3	9.1%	8	18.6%	10	27.0%	15	29.4%	59	23.2%
以宏觀經濟調 控部門為輔	10	15.4%	9	36.0%	9	27.3%	12	27.9%	6	16.2%	5	9.8%	51	20.1%
全非宏觀經 濟調控部門	23	35.4%	6	24.0%	13	39.4%	13	30.2%	8	21.6%	12	23.5%	75	29.5%

- 說明：1. 以財經高官首次就宏觀經濟調控部門任副部級領導職務的年份為基礎，計算就職前最後五個職務的部門屬性。
2. 「全為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意指五項職務均為本文界定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所屬機構，「以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為主」則是三至四項職務屬於宏觀經濟調控部門，「以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為輔」是指一至兩項職務屬於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全非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則代表五項職務均不在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當中。
3. 258人中有4人資料不全，未列入計算。

若只看最後一個職務，本文發現財經高官集中在國務院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工作的比例相當高，除1988~1992年間以外，其餘各時期均在50%以上。在過去三十年的平均比例高達55.9%，而且在過去十年內，集中程度已經超過六成，這顯示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正局級職務是財經高官的重要歷練，中共甄補財經高官時是以中央政府部門為重，以全國性、宏觀性的工作經驗為主。最典型的例子是現任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他從中國人民銀行綜合計劃司幹部、副處長、處長、計劃資金司副司長、司長、行長助理等職，升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再升至證監會主席一職。另外，還有少數財經高官來自省級政府的財經部門，過去三十年的平均比例為6.4%。如陳元從北京市商貿工作部部長及北京市體改會副主任，調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仲藜曾任黑龍江省計委主任、省計經委主任，後任財政部副部長。

由於各時期財經高官就任前的歷練屬於「全非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比例仍有二至三成，本文因此分析這些官員的職務經歷。這些官員在擔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領導職務以前的經歷大致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來自專業經濟管理部門，如農業部、工業部等，這些單位的業務雖與經濟活動有

關，但均與宏觀經濟調控無關。在被歸類在「全非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75位財經高官中，有45人具有專業經濟管理部門經歷。例如，姚振炎從電力工業部工程師、水利電力部副司長、司長升到副部長，1991年起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陳耀邦從農林部、農業部一路晉升為副部長，在1993年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

第二種情形是在國有企業（含銀行）或是研究單位任職，這一部分共有15人，其中楊明生、劉志峰、劉明康、盛華仁、李毅中、吳小平、吳曉華、陳新華、馬永偉等9人的工作經歷完全集中在國有企業。如楊明生在中國農業銀行工作二十餘年後，於2007年升任保監會副主席。張壽（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等3人職務以研究單位為主；王岐山具有國有企業及研究單位的經歷（農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級研究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農業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副行長）；戴相龍則以國有企業職務為主（中國交通銀行、農業銀行）。較特別的是吳儀和李克穆兩人，吳儀擔任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之前，曾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副經理，後來升任北京市副市長；李克穆任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之後調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再擔任保監會副主席。

第三種情形是就任前的五項經歷完全與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專業經濟部門、國有企業無關，共有15人。其中13人在地級市或省級政府擔任正副黨政首長，分別是李葆華、趙辛初、郭樹言、劉子厚、李瑞山、烏杰、蔣定之、薄熙來、閻海旺、徐鵬航、馬李勝、張吾樂、金人慶。另外，鮑彤是趙紫陽（時任國務院總理）的秘書，在1883~1988年間擔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黃丹華自1985年起就在共青團任職，先後擔任成都市團委副書記、四川省團委正副書記、團中央書記處書記，2003年起出任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紀委書記，並於2006年改任國資委副主任。在歸類在「全非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75位財經高官中，只有這15人在進入財經部會任職前的最後五項職務與經濟業務完全無關。

由以上分析可知，財經高官屬於內升或是由其他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調任的平均比例達到一半，特別是在過去十年當中，集中程度高達三分之二左右。此外，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與專業經濟部門、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金融業）之間，仍保有一定程度的流動。之前職務歷練完全是擔任地方政府黨職

的財經高官人數很少，而以組織、宣傳、統戰、紀檢四大黨務行政系統（或與這些職能相關的政府部門）經歷為主的財經高官更是稀少。因此，在財經高官「就任前的職務歷練」的部分，確實存在「系統內流動」的趨勢。

二、調職後的仕途發展

以下本文分析財經高官調職後的仕途發展。在258位財經高官中，有44人目前仍在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擔任第一個副部級職務，尚未調職。另有90人因不同原因終止仕途發展，如任內過世、退休、調至人大政協、群眾團體任職或擔任行會正副負責人，沒有擔任第二個黨政領導職務。分析其餘的124位財經高官後發現，離開第一個宏觀調控部門的副部級職務以後，繼續在這些部門工作至退休為止的比例呈現不斷上揚的趨勢，從1978~1982年間的39.4%上升到2003~2008年間的62.5%，僅在1998~2002年間一度下滑到38.9%（參見表七）。各時段財經高官調職後完全不在宏觀調控部門工作的比例則介於兩成二到四成四之間，近十年的比例有升高的跡象。

以全體數據來看，四成五的人全部在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發展。典型的例子如史紀良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調至中國銀監會副主席，然後進政協任職，退居二線；陳邦柱由國內貿易部部長轉任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接著也是進到政協任職。另外，約一成五的人調職後的工作部門主要是宏觀調控部門，如謝旭人在擔任財政部副部長之後，調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行長、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又先後擔任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部長；尚福林從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調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2年後於2002年升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至今。換言之，這兩類的財經高官合計約六成。由此可見，財經高官調職後仍以宏觀調控部門為最主要的工作機構。

由於三成的財經高官調職後並未在宏觀經濟調控部門任職，本文繼續追蹤這37位高官的仕途去向。首先，14人調往專業經濟部門工作，如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劉志峰調任建設部副部長後，於61歲時退休；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張吾樂在61歲時出任國家有色金屬工業局局長，並於3年後退休；曾憲林在1987年離開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職位後，升任輕工業部部長；陳耀邦在1993年4月任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1997年7月升任

表七 財經高官調職後的工作部門屬性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全為宏觀經濟 調控部門	13	39.4%	8	44.4%	9	50.0%	14	48.3%	7	38.9%	5	62.5%	56	45.2%
以宏觀經濟調 控部門為主	8	24.2%	2	11.1%	3	16.7%	5	17.2%	1	5.6%	0	0.0%	19	15.3%
以宏觀經濟調 控部門為輔	3	9.1%	3	16.7%	2	11.1%	2	6.9%	2	11.1%	0	0.0%	12	9.7%
全非宏觀經濟 調控部門	9	27.3%	5	27.8%	4	22.2%	8	27.6%	8	44.4%	3	37.5%	37	29.8%

說明：1. 以財經高官調離第一個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副部級職務的年份為計算基礎。
 2. 258人中有44人尚未調職，90人調職後退休、任內過世、退居二線，沒有第二個黨政領導職務，均未列入計算。
 3. 大部分官員調職後的職務數目不多，本表改以「比例」計算。「全為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意指調職後職務均為本文界定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或領導人職務，「以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為主」則是調職後所有職務超過一半屬於宏觀部門，「以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為輔」是指不到一半職務屬於宏觀部門。若調職後只經歷兩個職務，一個在宏觀部門，另一個則非宏觀部門，則以時間長短區分。「全非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則代表調職後均非宏觀部門。國有企業（包括國營銀行）負責人被歸類為非宏觀經濟調控部門，但若超過58歲時被調至國有企業，因已達副部級幹部轉崗年齡，則視為退居二線。

林業部部長，並在1998年3月改任農業部部長；李盛霖原為天津市市長，在2003年5月出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2005年12月擔任交通部部長，並在2008年擔任新組成的交通運輸部部長。另有3人調往國有企業或金融單位工作，包括韓雷（從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調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武博山（財政部副部長調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高西慶（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調任中國投資公司總經理）。以上兩類加起來共16人，即有四成六的人是在專業經濟部門、國有企業工作，仍與經濟活動有關。

其次，財經高官轉往國務院政務部門與教育科技文化、社會保障和資源管理部門任職者共9人，分別是趙辛初（原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調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與糧食部部長）、郭樹言（由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調任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徐青（原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1987年調任監察部副部長，67歲時轉任中紀委常委）、郭振乾（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調任審計署副署長，最後升任署長）、王勇（原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任，2008年4月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趙東宛（由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調任勞動人事部部長、人事部部長）、王東進（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調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高強（原財政部副部長，2001年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2003年起任衛生部副部長）、劉山在（1998年從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副部長調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再者，擔任省級正副首長者共有5人，分別是忻元錫（1982年由財政部副部長調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包敘定（原發改委副主任，調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市長）、薄熙來（原商務部部長，調任重慶市委書記）、王萬賓（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後擔任廣西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區委副書記）、屠光紹（原證監會副主席，2007年12月調任上海市副市長）。調任黨務部門一把手的財經高官極少，只有原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丁關根在1990年11月至2002年11月間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宣傳部部長。

最後，有5位財經高官的調動情況比較複雜，在不同類型的工作部門任職。蕭捷分別在省級政府和國家政務部門任職，由財政部副部長調任湖南省副省長，2007年9月升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現任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原是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副主任，先調任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再轉任重慶市委書記。徐鵬航則從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轉任國有企業和軍事科技部門，先後擔任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原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2007年3至10月間短暫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隨後在58歲時調任中國投資公司董事長。原證監會副主席李劍閣先調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後調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從以上分析來看，財經高官調職後的仕途發展仍以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為主，但一定比例的人調往專業經濟部門或國有企業工作，如同一部分財經高官是從這些單位轉來。財經高官轉任省級黨政正副首長的機會不高，轉任國家政務部門的比例也很小，擔任黨務部門主管的更是只有1位。這個現象顯示財經高官與黨務行政官僚的流動管道分立的現象。

根據上述財經高官就任前的經歷和轉崗後的仕途發展分析，本文認為財經高官確實出現「系統內流動」的現象，但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與專業經濟部門、國有企業暨研究單位之間的流動仍然存在。因此，若是依照本文對財經

高官的定義，「系統內流動」的命題只是部分成立。不過，財經高官的主要歷練是擔任省級黨政正副首長，或在國務院政務部門與教科文社保部門長期工作的情形確實不多見。總結來看，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專業性導致財經官員專業性提升、晉升管道也相對封閉，以致出現系統內部流動比例很高的現象。然而，這也暗示他們仕途發展的侷限性——財經高官與黨務高官應該各有不同晉升管道的現象，前者很難成為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唯一培訓通道。本文的分析呼應魏昂德(A. Walder)、臧小偉等人的菁英流動二元論。

柒、財經高官的政治憑證

在討論完財經高官「系統內流動」的議題之後，本文接著從黨籍、入黨年齡、黨職歷練等三個變項，檢驗命題五（財經高官多在學生時代入黨，為政治積極分子）和命題六（黨職經歷是財經高官晉升的重要關鍵）。在黨籍方面，全體258位財經高官中，有7人無法確認黨籍，其他251人皆為中共黨員。這7位無法確認黨籍的財經高官分別是高尚全、李劍閣、金立群、吳曉靈、史亞倫、魏迎寧、吳小平，就算這7人均非中共黨員，也只占全體財經高官的2.7%，這個比例遠低於非共人士在全國省部級幹部中的比例。1981～1998年間，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在全國省部級上幹部的比例從6.1%上升至9.3%（中共中央組織部，1999：5）。超高的黨員比例顯示中共甄補財經高官時，非常重視他們的黨員身分。近年來，中共擴大非共人士的政治參與，刻意提拔優秀的非共人士擔任正副省部級政府職務。³¹儘管非共人士在全國省部級幹部的比例逐漸上升，他們在財經高官的比例卻一直非常低。這顯示中共在重視財經高官專業性的同時，也非常重視他們的政治憑證，重視的程度甚至遠高於其他部門的高官。

在入黨年齡方面，表八顯示的數據較為混亂。1978～1992年間，不論級別高低，25歲以前（完成碩士學程以前）入黨的比例都非常高，至少六成以

³¹ 200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接受記者詢問時表示，27個省級政府，15個副省級城市都配置了黨外副省長（或副主席、副市長）（王新玲，2007）。2007年4月27日，胡錦濤任命中國致公黨成員萬鋼擔任科技部部長，更是35年來首位非共人士出任國務院部會首長。2007年6月29日無黨籍人士陳竺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二位擔任國務院部委正首長的非共人士。

上，而且多為九成五以上；26~40歲入黨的比例偶爾超過三成，通常都不到一成；41歲以後入黨的財經高官更少，幾乎完全無人。但在1993~2008年間，入黨年齡分布明顯變得較為分散，副部級財經高官在25歲以前入黨的比例從43%升到58%，晉升到領導人的財經高官則在50.0%~66.7%之間，但晉升為正部級財經高官則從六成下降到兩成；26~40歲之間入黨的副部級財經高官從五成降至三成三，正部級財經高官在同年齡層入黨的比例從兩成增加到七成，領導人則介於三成到五成。³²不過，41歲以後入黨的財經高官仍然不多，除正部級財經高官的比例在一成至兩成之間波動外，副部級高官和領導人部分的比例都不到一成。

不過，從混亂的數據中仍可看出三個特徵。首先，隨著革命幹部退休，財經高官的入黨年齡出現結構性的上升。1992年以前的財經高官仍有一部分實際參與過中共建政以前的國共鬥爭，因此入黨年齡很低，等到幹部四化政策持續一段時間，參與革命建國過程的老幹部退休之後，新崛起的財經高官入黨年齡就相對年長許多。此一現象顯示，入黨年齡不再是財經高官最關鍵的政治憑證；其次，1990年代以後，隨著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專業性愈來愈強，中共逐漸願意重用一些在專業上嶄露頭角後才入黨的財經官僚。舉例來說，現任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是在42歲時加入中共，曾任甘肅省省長、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的張吾樂是45歲時加入中共，曾任財政部部長的項懷誠在44歲入黨，曾任農業部部長的陳耀邦更是在47歲時才入黨。這些都是中共向專業性妥協的例子。不過，除非專業性特別凸出，41歲以上入黨的幹部被重用的機會已經不大，因此所占比例很低；第三，40歲以後入黨的財經高官雖然有機會擔任正副部級職務，但只有入黨年齡較輕的人才較有機會擔任黨中央或國務院領導人職務，他們的平均入黨年齡只有22.1歲，低於晉升副部級、正部級職務的24歲和25.8歲，這又顯示入黨年齡仍是重要的政治憑證。根據上述分析，命題五部分成立（中共黨身分），部分不成立（入黨年齡）。

³² 3位30歲以後入黨而又能擔任領導人職務的財經高官分別是曾培炎、王岐山、薄熙來，後兩人均為典型的「太子黨」。

表八 財經高官入黨年齡分布

晉升副省部級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20歲以下	38	65.5%	11	50.0%	5	18.5%	4	13.3%	5	20.8%	6	25.0%	69	37.3%
21~25歲	18	31.0%	8	36.4%	13	48.1%	9	30.0%	6	25.0%	8	33.3%	62	33.5%
26~30歲	1	1.7%	2	9.1%	6	22.2%	7	23.3%	6	25.0%	4	16.7%	26	14.1%
31~35歲	1	1.7%	0	0.0%	1	3.7%	5	16.7%	4	16.7%	3	12.5%	14	7.6%
36~40歲	0	0.0%	0	0.0%	2	7.4%	3	10.0%	2	8.3%	1	4.2%	8	4.3%
41~45歲	0	0.0%	1	4.5%	0	0.0%	1	3.3%	1	4.2%	2	8.3%	5	2.7%
46~50歲	0	0.0%	0	0.0%	0	0.0%	1	3.3%	0	0.0%	0	0.0%	1	0.5%
小計	58	99.9%	22	100.0%	27	99.9%	30	99.9%	24	100.0%	24	100.0%	185	100.0%
平均年齡	24.0													
晉升正省部級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20歲以下	6	60.0%	2	66.7%	4	100.0%	2	20.0%	1	14.3%	2	20.0%	17	38.6%
21~25歲	3	30.0%	1	33.3%	0	0.0%	4	40.0%	0	0.0%	0	0.0%	8	18.2%
26~30歲	0	0.0%	0	0.0%	0	0.0%	1	10.0%	2	28.6%	3	30.0%	6	13.6%
31~35歲	1	10.0%	0	0.0%	0	0.0%	0	0.0%	0	0.0%	3	30.0%	4	9.1%
36~40歲	0	0.0%	0	0.0%	0	0.0%	1	10.0%	3	42.9%	1	10.0%	5	11.4%
41~45歲	0	0.0%	0	0.0%	0	0.0%	2	20.0%	1	14.3%	1	10.0%	4	9.1%
46~50歲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小計	10	100.0%	3	100.0%	4	100.0%	10	100.0%	7	100.0%	10	100.0%	44	100.0%
平均年齡	25.8													
晉升領導人級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20歲以下	4	66.7%	5	100.0%	2	40.0%			0	0.0%	2	50.0%	13	56.5%
21~25歲	2	33.3%	0	0.0%	1	20.0%			2	66.7%	0	0.0%	5	21.7%
26~30歲	0	0.0%	0	0.0%	2	40.0%			0	0.0%	0	0.0%	2	8.7%
31~35歲	0	0.0%	0	0.0%	0	0.0%			0	0.0%	2	50.0%	2	8.7%
36~40歲	0	0.0%	0	0.0%	0	0.0%			1	33.3%	0	0.0%	1	4.3%
41~45歲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46~50歲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小計	6	100.0%	5	100.0%	5	100.0%	0		3	100.0%	4	100.0%	23	100.0%
平均年齡	22.1													

說明：1. 以財經高官首次就任各級別領導職務的年份為計算基礎。
 2. 副部級財經幹部共有56人出生年齡或入黨年份資料不全，未列入計算。

在黨職歷練方面，本文發現確如命題六所述，財經高官若不具備專職黨職歷練，晉升機會將隨著級別提高而減少（參見表九）。在擔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副部級職務的財經高官中，平均只有9.0%具黨職經歷，各時段變化很小，晉升為正部級幹部的財經高官中，38.6%具有黨職經歷。除了1998~2002年間無人具有專職黨職外，各階段均在四成至六成七之間。金人慶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1995年起擔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副書記共兩年半後，再調回國務院，擔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在晉升到黨政領導人的財經高官中，73.9%已經歷練過黨職，例如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王岐山，離開財經部門後歷任廣東省委常委、海南省委書記、北京市委副書記（兼任市長），之後升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近十年具有黨職歷練的比例雖較過去下降，但仍維持在五成以上。

表九 財經高官的黨職歷練

擔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副部級職務前的黨職經歷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有	8	12.7%	2	8.0%	3	10.3%	3	7.0%	3	8.6%	3	6.0%	22	9.0%
無	55	87.3%	23	92.0%	26	89.7%	40	93.0%	32	91.4%	47	94.0%	223	91.0%
小計	63	100.0%	25	100.0%	29	100.0%	43	100.0%	35	100.0%	50	100.0%	245	100.0%
擔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正部級職務前的黨職經歷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有	4	44.4%	2	66.7%	2	50.0%	5	50.0%	0	0.0%	4	40.0%	17	38.6%
無	6	55.6%	1	33.3%	2	50.0%	5	50.0%	7	100.0%	6	60.0%	27	61.4%
小計	10	100.0%	3	100.0%	4	100.0%	10	100.0%	7	100.0%	10	100.0%	44	100.0%
擔任黨政領導人職務前的黨職經歷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1997		1998~2002		2003~2008		全體人員	
	N	%	N	%	N	%	N	%	N	%	N	%	N	%
有	4	66.7%	4	80.0%	5	100.0%			2	66.7%	2	50.0%	17	73.9%
無	2	33.3%	1	20.0%	0	0.0%			1	33.3%	2	50.0%	6	26.1%
小計	6	100.0%	5	100.0%	5	100.0%	0		3	100.0%	4	100.0%	23	100.0%

說明：1. 有12人未當過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副部級職務而直接擔任正部級職務，未包括在副部級高官的統計範圍。朱鎔基、趙紫陽、鄧家華、李貴鮮4人是領導人兼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職務，故不算晉升至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正部級職務的範圍內。

2. 以財經高官首次就任各級別領導職務的年份為計算基礎。

由此可見，黨職歷練對於副部級財經高官的任命並不重要，但對於晉升黨政領導人就非常重要，對於晉升正部級職務的重要性則介於兩者之間。在過去三十年間，由於黨仍然是中共政權的核心，黨職的重要性並未隨著時間而產生變化。這種強調黨職經歷的甄補偏好是中共重視政治憑證的具體表現，直接影響幹部晉升與否的一大關鍵，也是後極權主義特性對菁英甄補的具體影響。

捌、結論

中共的改革開放是以經濟改革為核心，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領導幹部身負市場轉型與經濟發展的重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嘗試從政權特性的角度，解釋過去三十年來中共財經高官仕途流動的特徵與趨勢。目前中共具有「發展型國家」和「後極權主義」兩種特性，這種二元特性導致財經高官的特殊甄補模式——「重視市場經濟專業下的政治優先」。「重視市場經濟專業」是受到發展型國家特性的影響，「政治優先」則是受到後極權主義特性的影響。二元特性使得中共菁英甄補方式，分別與東亞發展型國家、蘇東後極權政權下的菁英甄補有類似之處，又不完全等同於之。中共在甄補財經官僚時，市場經濟專業與政治忠貞度並重，但因維持政權仍為核心目標，職務愈高時，政治忠貞度的考量愈來愈重要。本文分析258位財經高官的仕途發展之後，所得結果大致支持此項論點。

本文從學歷、學科專業、留學經驗三個指標檢驗發展型國家特性（經濟技術官僚崛起）對財經高官專業憑證的影響。結果發現，近年來財經高官的學歷已經提升到以研究生學歷為主，比例高達近七成；具有經貿管理學科專業的比例愈來愈高，達六成以上；前往歐美國家留學的比例也逐漸提升，占約四分之一，並以攻讀學位為主體，而非短期進修。這些趨勢皆與全國省部級幹部的總體趨勢不同，顯示專業憑證的重要性。

除了學歷背景之外，本文特別從職務歷練的角度分析專業憑證的重要性，展現發展型國家的影響。此外，近年來財經高官「系統內流動」的趨勢確實存在，印證專業憑證的重要性。不論是從「就任前的職務歷練」或是「調職後的仕途發展」來看，近年來，超過六成以上的財經高官是在國務院

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內升或相關部門間的調動，不然就是由地方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調升至國務院相關部門工作。不過，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與專業經濟部門、國有企業之間的相互流動仍占一定比例。財經官員專業性的提升也顯示其仕途發展的侷限性。財經高官之前職務歷練完全是擔任地方政府黨職的人數很少，而以組織、宣傳、統戰、紀檢四大黨務行政系統（含與這些職能相關的政府部門）經歷為主的人更是稀少，調職後的任職崗位也很少是這些單位。

其次，本文從黨籍、黨齡及專職黨職等三方面觀察後極權主義特性（政治獨占）對財經高官政治憑證的影響。在全體258位財經高官中，97%具有中共黨籍，遠高於中共黨員在全國省部級幹部中的比例。同時，黨職歷練的重要性隨著級別升高而增加，副部級財經高官有黨職經驗的比例不到10%，正部級財經高官歷練過黨職的比例增加為四成，最後晉升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的財經高官中，具有黨職經驗的比例更提高到七成以上。這種職級愈高、黨職經驗愈重要的趨勢並未因市場化程度愈高而改變。不過，入黨年齡的重要性已經降低，這一方面是幹部世代交替之後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向專業憑證妥協的結果。能夠晉升為領導人的財經高官多半是在青年時期入黨，同時無人是在40歲以後入黨，這顯示隨著職級提高，入黨年齡做為政治憑證的重要性又增加。

吳玉山(2007: 322-324)曾經指出，後極權主義、發展型國家兩種特性之間會彼此協調讓步。在菁英甄補面向中，兩種特性既有相近之處，但也有須彼此調適的地方，後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技術官僚統治，與發展型國家中的經濟官僚受到統治者重用非常接近，但兩種政權特性彼此調和讓步的情形仍然對菁英甄補造成影響。舉例來說，市場經濟導向的專業憑證取代計劃經濟導向的專業憑證，可說是後極權主義向發展型國家妥協的例證。因此，本文發現有留學經驗的財經高官多半是前往歐美國家攻讀學位，而非赴蘇東國家求學或到歐美國家短期進修講學。中共甚至聘請非黨籍、具有香港公民身分的史美倫擔任證監會副主席，協助建立大陸證券市場。在此同時，發展型國家也有遷就後極權主義之處，例如財經高官往更高職級晉升時，層級愈高則政治憑證的重要性愈高，入黨年齡與黨職歷練都是如此。

總體來看，本文對中共菁英流動的研究有兩點貢獻。首先，將政權型態

與菁英甄補結合起來，讓吾人更清楚看到政權特性在政治篩選(*political screening*)中扮演的角色。透過中共二元政權特性的掌握，本文指出專業憑證與政治憑證對中共菁英甄補的重要性，不可忽略兩者其中之一。原因很簡單，任何一種憑證的必要性都可回溯至中共政權的特性，是為了延續政權的生存目的而存在。第二，在建立專業憑證、政治憑證的指標時，本文發現必須隨著大環境改變而調整的空間。例如，研究生學歷已成多數財經高官的主要學歷，因此進行中共菁英研究時應該將其與大學本科學歷分成兩類，不應以「大學本科以上」做為分類方式，同時還應該將國外留學的經驗一併納入分析。最重要的是，過去相關研究通常只用教育背景做為專業憑證的指標，本文則將職務歷練納入分析，強化專業憑證的內涵。本文也發現，入黨年齡的重要性隨著時代演進與幹部職級提高而出現差異，並非固定不變，這個初步結果提醒吾人未來應該分析這種現象是否也在全國高幹中出現。

不過，本文仍然面臨一些研究限制，有待未來繼續努力。在概念上，後極權主義、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三者的區別還未有人實際做過多國比較分析。菁英流動畢竟只是其中一個面向，而非全部，未來仍有繼續鑽研的空間。此外，本文並未在比較的視野下探討政權型態對菁英甄補的影響，未來若能比較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現今中共）與發展型國家（如台灣威權時代）、極權主義（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下的菁英甄補，或是比較財經高官與組織、宣傳、統戰、紀委等黨務官僚的政治流動，使之彼此對照，就能更強化政權型態與菁英甄補之間的因果關係。在個案分析上，除了資料不夠完整的先天性問題之外，本文無法建立觀察幹部政績的測量指標，只能以職務歷練做為彌補，也無法在入黨年齡、專任黨職等（對政權）政治忠貞度的指標之外，建構觀察關係網絡的指標，以便納入（對領導人）政治忠貞度的指標。最後，新生代菁英被甄補至政權以後，是削弱或是強化中共二元政權特性，對於中共政權的延續會產生何種影響，本文也未論及，有待未來繼續研究。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Radiopress, 1978~2007, 《中國組織別人名簿 (China Directory)》, Tokyo: 作者。
-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2006, 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policy/txt/2006-05/31/content_6225708.htm。2009/1/1。
- 〈中國證監會簡介〉, 2006,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banshi/2006-11/28/content_455561.htm。2009/1/1。
- 〈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簡介〉, 2004, 新浪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40707/1115855855.shtml>。2009/1/1。
-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正式成立〉, 無日期, 改革開放30年論壇: <http://gaige.chinareform.net/px7/0098.html>。2009/1/1。
-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2003年)〉, 2003, 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3/07/content_763225.htm。2009/1/1。
- 中共中央組織部, 1999, 《黨政領導幹部統計資料匯編 (1954~1998)》, 北京: 黨建讀物。
-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編), 2004, 《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 (1921~2003)》, 北京: 中共黨史。
-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央檔案館 (主編), 2000,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 (1921~1997)》 (全十三卷), 北京: 中共黨史。
- 中共研究雜誌社, 2006, 《中共年報2007》, 台北: 作者。
- 王明高, 2002, 〈中國共產黨整黨整風的歷史經驗及其當代啓示〉, 《湖南社會科學》, 第4期, 頁130-131。
- 王新玲, 2007, 〈陳喜慶: 符合條件的黨外人士擔任正職是長期政策〉, 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11/content_6861629.htm。2009/1/1。
- 田文生, 2008, 〈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 中專學歷的經濟「大管家」〉, 《中國青年報》, 2008/3/18, 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08-03/18/content_2106841.htm。2009/1/1。
- 白樺 (主編), 2004, 《中國老齡工作年鑑 (1982~2002)》, 北京: 華齡。
- 何虎生 (編), 2003,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官志》, 北京: 中國社會。

- 吳玉山，2003，〈探入中國大陸經改策略之研究：一個比較的途徑〉，《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3期，頁1-31。
- 吳玉山，2007，〈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載於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頁309-335，台北：五南圖書。
- 李強，2001，〈後全能體制下現代國家的構建〉，《戰略與管理》，第6期，頁77-85。
- 李景鵬，2005，〈後全能主義時代的公民社會〉，《中國改革》，第11期，頁36-37。
- 林佳龍、徐斯儉，2003，〈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載於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頁11-30，台北：時報文化。
- 席曉勤、郭堅剛，2003，〈全能主義政治與後全能主義社會的國家構建〉，《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第4期，頁15-20。
- 徐現祥、王賢彬、舒元，2007，〈地方官員與經濟增長〉，《經濟研究》，第9期，頁18-31。
- 徐賁，2005，〈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當代中國研究》，第12卷第4期，頁4-26。
- 浦興祖（編），1999，《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上海：上海人民。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中國的民主政治白皮書〉，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9/content_3645697.htm。2008/4/26。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7，〈中國的政黨政治白皮書〉，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1/15/content_7078939.htm。2008/4/26。
- 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中央編委辦公室綜合司（編），1998，《中央政府組織機構（1998）》，北京：改革。
- 寇健文，2001，〈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5期，頁1-17。
- 寇健文，2002，〈權力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載於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頁53-72，台北：新新聞文化。
- 寇健文，2005，《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04）》，台北：五南圖書。
- 寇健文，2006，〈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3期，頁39-75。
- 寇健文，2007a，〈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4期，頁49-95。
- 寇健文，2007b，〈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3期，頁1-28。
- 康曉光，2002，〈再論「行政吸納政治」——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

- 研究》，《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5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6084.htm>。2009/1/1。
- 張毅，2003，〈從外貿部到商務部的變化軌跡〉，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3/10/content_769880.htm。2009/1/1。
- 曹聰，2007，〈中國的科學菁英及其社會角色〉，《當代中國研究》，第14卷第1期，<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70110&total=96>。2009/1/1。
- 黃信豪，2008，〈有限活化：中國黨政體制下的菁英流動，1978-2008〉，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楊立杰、谷玥，2003，〈精兵減政，轉變職能——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政府機構改革〉，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3/06/content_761776.htm。2009/1/1。
- 楊光斌，2003，《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溫源，2003，〈一行三會，成就金融監管新格局〉，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3-04/14/content_831024.htm。2009/1/1。
- 趙丙臣，2008，〈新任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中專學歷受關注〉，《中國青年報》，2008/3/25，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3/25/content_2115911.htm。2009/1/1。
- 蕭功秦，1999，〈後全能主義時代的來臨：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各階層政治態勢和前景展望〉，《當代中國研究》，總第64期，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015。2009/1/1。
- 蕭功秦，2000，〈後全能體制與21世紀中國的政治發展〉，《戰略與管理》，第6期，頁1-8。
- 蕭功秦，2002，〈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頁82-88。
- 蕭功秦，2004，〈中國大陸的發展型權威政治演變的過程及其對經濟與社會的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47卷第4期，頁107-118。
- 顧錢江、王立彬、常曉華，2003，〈銀監會浮出水面，中國金融改革提速〉，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3-03/11/content_772031.htm。2009/1/1。

二、英文部分

- Bachman, D., 2001.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China Journal*, No. 45, pp. 95-100.
- Baek, S.-W., 2005. "Does China Follow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5, No. 4, pp. 485-498.
- Bo, Z., 2002.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 Mobility Since 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 Bo, Z., 2003. "The Provinces: Training Ground for National Leader or a Power in Their Own Right?" In D. M. Finekelstein & M. Kivlehan, eds.,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pp. 66-117.). Armonk, NY: M. E. Sharpe.
- Bo, Z., 2005.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Elite Politic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Toward a Perspective of 'Power Balancing'." *Issues & Studies*, Vol. 41, No. 1, pp. 162-189.
- Breslin, S. G., 1996. "China: Developmental State or Dysfunction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7, No. 4, pp. 689-706.
- Cao, C., 2004. *China's Scientific Elite*.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Cao, C., & Suttmeier, R. P., 1999. "China's 'Brain Bank': Leadership and Elitism in Chines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ian Survey*, Vol. 39, No. 3, pp. 525-559.
- Dittmer, L., 2001.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China Journal*, No. 45, pp. 53-67.
- Dittmer, L., 2004. "Leadership Change and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Y.-H. Chu, C.-C. Lo, & R. H. Myers, eds.,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pp. 10-3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 Huang, J., 2008.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In C.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p. 80-9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Johnson, C.,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In M. Woo-Cum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pp. 32-6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u, C.-W., 2008, May. "Elite Recruitment and the Post-totalitarian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Mobility of Western-educated Returnee Elites in China, 1978-2008."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Washington Consensus" versus "Beijing Consensus." co-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US Cooperation at University of Denver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nver.
- Leftwich, A., 1995. "Bringing Politics Back in: Towards a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Studies*, Vol. 31, No. 3, pp. 400-427.

- Li, C., 2001.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Li, C., 2005a.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6, pp. 1-21.
- Li, C., 2005b. "Coming Home to Teach: Status and Mobility of Returnee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C. Li, ed., *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U. 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2003*. (pp. 69-109.).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Li, C., & White, L., 1988.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Vol. 28, No. 4, pp. 371-399.
- Li, C., & White, L., 1998.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8, No. 3, pp. 231-264.
- Linz, J. J., 2000.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Linz, J. J., & Stepan, A.,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owenthal, R., 1970.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pp. 33-11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wenthal, R., 1983. "The Post-Revolutionary Phase in China and Russi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16, No. 3, pp. 191-201.
- Miller, A. L., 2008.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Chinese Leadership Politics." In C. Li, ed.,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pp. 61-79.).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Nathan, A., 2003.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pp. 6-17.
- Naughton, B., 2008. "China's Economic Leadership after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23, pp. 1-12.
- Onis, Z., 1991.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4, No. 1, pp. 109-126.
- Pei, M.,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1976.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chwartz, D. C., 1969.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Recruitmen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22, No. 3, pp. 552-571.
- Seligman, L. G., 1961.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Party Structure: A Case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5, No. 1, pp. 77-86.
- Seligman, L. G., 1964.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6, No. 3, pp. 612-626.
- Shambaugh, D., 2001.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China Journal*, No. 45, pp. 101-111.
- Shirk, S. L., 2001. "Will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Survive the 2002-03 Succession?" *China Journal*, No. 45, pp. 139-142.
- Teiwes, F. C., 1995.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China Journal*, No. 34, pp. 55-94.
- Walder, A. G.,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3, pp. 309-328.
- Wu, Y.-S., 2007.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Afte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Asian Survey*, Vol. 47, No. 6, pp. 977-1001.
- Zang, X., 1991a. "Elite Forma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Technocracy in Post-Mao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24, No. 1, pp. 114-123.
- Zang, X., 1991b. "Provincial Elite in Post-Mao China." *Asian Survey*, Vol. 31, No. 6, pp. 512-525.
- Zang, X., 1993.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pp. 787-803.
- Zang, X., 1998.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Recruitment in Post-Mao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Vol. 16, No. 1, pp. 39-57.
- Zang, X., 2001. "University Education, Party Seniority, and Elite Recruit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30, No. 1, pp. 62-75.
- Zang, X., 2004.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 Zang, X., 2005.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lite Behavior in Reform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1, No. 1, pp. 204-217.
- Zheng, S., 2003. "Crossing the Political Minefields of Succession: From Jiang Zemin to Hu Jiantao." In J. Wong & Y. Zheng,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pp. 59-8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 Zheng, Y., & Lye, L. F., 2003. "Elite Politics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s. 1 & 2, pp. 65-86.

Zhou, X., 1995. “Partial Reform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the Post-Mao Er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8, No. 3, pp. 440-468.